

CONTENTS

目录



◆精神丰碑

- (04) 关于交大西迁的几个问题 /贾箭鸣
- (08) 从南洋公学到西安交通大学——纪念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 /朱继洲
- (19) 爱国主义永远是交大人前进的大旗 /王世昕
- (21) 小我与大我的博弈——西迁精神的核心内涵 /卢烈英
- (23) 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再创西安交大新的辉煌 /朱正威 崔瑞锋 梅红
- (27) 为世界之光——交大校训与西迁精神管窥 /燕连福
- (32) 也应青史有诗篇——从交大西迁看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 /韩鹏杰
- (33) 西迁精神与大学文化精神 /黎 荔
- (35) 西迁精神与交大愿景 /李永胜
- (42) 交通大学西迁与西部大开发 /祝玉琴
- (47) 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溯源和传承 /赵志华
- (50) 西迁精神: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刘 蓉 宋 欣
- (52) 西迁精神的内涵、传承方式及其具体表现
——兼论西迁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意义 /范高社 杨 凌
- (57) 西迁精神:用理想主义铸就大学灵魂 /李 重
- (59) 百年中国历史变迁下的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解读
——论交大胸怀天下的大局意识 /宋希斌
- (62) 发扬西迁精神,以科技创新港引领西部大发展 /王小红
- (66) 西迁精神之我见 /郭巨宏 李天富
- (69) 西迁精神的普遍性意义 /郑冬芳 王静宜

- (72)西迁精神与中国梦 /张 勇
- (76)从西迁精神看大学的责任与担当 /王 伟
- (80)胸怀大局:交通大学的西迁与科技创新驱动战略 /悦中山 张瑞璇
- (83)西迁精神的思想底蕴和时代价值 /田建军
- (86)西迁精神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郑冬芳 王静宜
- (89)扎根西部,建设西部,沿着西迁之路前进 /公管学院 教工第二党支部
- (92)西迁精神:砥砺双甲子奋进路 助力三世纪复兴梦
——纪念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 /白 鹭
- (95)西迁精神的内涵及力量何在? /公管学院 博1243党支部
- (98)中国梦与交大梦:新时代背景下的西迁精神探讨 /公管学院 硕4064党支部
-

◆如歌岁月

- (102)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蓝天下成长 /徐通模
- (104)重温交大西迁精神/张玉璋
- (106)我爱西安,我爱交大 /何卓烈
- (111)回忆我的“后西迁” /吴寿镗
- (114)西迁60年回顾 /谈文心
- (117)860人创业二三事 /杨治规
- (118)耄耋回首当年 /陆文华
- (120)西迁热土上二三事 /熊则男
-

◆耄耋回望

- (124)饮其水怀其源的交大人——卢烈英专访 /闫新辉 乔婷 于之云
- (126)回望西迁路途 追忆峥嵘岁月——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学生处
- (127)兢兢业业的交大人——访西迁教师孙育成 /韩亚楠 仇天聪
- (129)永不流逝的青春——访附中西迁老教师王兆瑚 /附中
- (130)小故事悟大精神——访徐茂义 /公管学院 “印象时光”采访组
- (132)交大人,永不褪色的记忆——访张发荣 /王昕红 吴静娴 朱娇娜 陈杰 杨若愚



精神丰碑



关于交大西迁的几个问题

校史中心 贾箭鸣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60年后看交大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四、正确认识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这里兹简要分述如下: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陈毅4月2日的批示是送陈云副总理审核。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林枫和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4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这样就有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是一所

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改办工科,如清华、浙大、同济、重大等等,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其他都是新建的各类工学院,不称为大学。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教授交大最多。交大与清华相比,交大多了一个造船系,清华多了一个建筑系,其他大体类似。哈工大是学苏联的前沿高校。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值得注意的是,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但客观看,上海的要求是有道理的。这样,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就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

讲话。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这样,1959年3月,在公布第一批16所国家重点大学时,就出现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两个学校,可见当时就已经考虑分设了。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实际上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高教部长杨秀峰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

在全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高教部将迁至西安的部分与西安动力学院全部,西农的工科性质一个系,西工军工以外的纺织、地质、采矿系合并起来,使学校能够承担更多任务,也由此催生了西北工业大学。同时,交大上海部分也将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重新合并为一所学校,从而优化了当时的布局。

1956年交大面向全国招生,1959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都是杨秀峰任内决定的。1983年在杨秀峰去世当年,他还为交大进入国家重点建设出了很大的力。

陕西省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哪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1956年迁校后,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仅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学生把西安校园闹得不像样子,甚至跑到外单位闹,影响很坏。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做工作,在建工厂的厂长、工程师都来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

上任后一如既往支持,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但也有压力。1956年市上开人代会,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批评市委不挽留交大。刚才讲过,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迁校发生争论,柯庆施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正如杨秀峰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对整个西部建设都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万之多。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动作很快。接到电话通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其次是组织严密。彭康总览全局,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迁校之初的领导班子很小,校领导就是彭康、陈石英两人,后来增加苏庄,到1958年由于陈石英调去负责南洋公学,学校分设两地,才又增加陈大燮、程孝刚任副校长。邓旭初开始是校办主任,迁校中任命为副书记,但当时党委功能与现在不同,学校还在实行校委会领导。其他几位党委常委是人事处长等部门负责人)

第三是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来校苏联专家有26个;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还要保证。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務。学校对此处理得很好,三个教务长陈大燮、张鸿和黄席椿

出了大力。另外,彭康提出1956年一、二年级先迁,在西安上基础课;1957年等实验室建好后再迁各专业和高年级学生,从步骤上是正确的。

第四是抓好后勤保障。迁校中的后勤保障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心理。

第五是正确处理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4月份上海方面校工会动员迁校,结果形成否定迁校潮流;5月份西安学生担心上海的不再来了,来的回不去了,也开始闹。就是国务院6月4日开会研究之后,也还是闹了一些天。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彭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是调动积极因素。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它本是一株江南鱼米之乡长了60年的老树,却要去黄土漫漫的大西北生根、开花、结果;它成长在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富庶、发达、繁华的沿海大都市,却要去一个沉寂千年的西部古城重新开始。迁校中的几载风雨年华无论对学校还是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太多熟悉的东西,勇于去一个陌生和艰苦的地方来肩负重大使命、奠定千秋基业、攀登新的高峰。因此,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什么是事业?机、电、动大部分迁到西安,体现最新科技发展的新专业建在西安,西安校园中的实验室面积超过上海3倍,这就是事业。

交通大学教师队伍中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这里有两组数字:

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556人中(不包括即将成为上海造船学院的原交大造船系教师,和决定迁往成都的电讯系教师),迁来西安的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最终

留在上海的这215人中,也曾有51人(占9.2%),其中包括朱公谨、朱麟五、单基乾、熊树人、归绍升等多位知名教授,迁校期间坚持在西安任教,有的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后来返回上海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所在运输起重系的整体迁回,二是学校后来又决定抽调已在西安的机、电、动等专业一部分师资,返回去支援上海。真正由于身体、家庭等因素迁回的仅是个别人。

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留在上海的230人,其中教授40人、副教授10人、讲师55人、助教125人,占教师总数30%。何以这年在册教师数字较上年有较大变化?这是因为西迁和发展新兴专业的缘故,高教部批准学校增加了一大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青年教师。在这批青年教师中,有80%的同志加入了西迁队伍,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他们在西迁风雨中成长,在当时就已经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又经过多年磨砺成为学校发展的顶梁柱,其中当选为院士的就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等。另外随西工并入的青年教师姚穆后来也当选院士。

事实上,志存高远的交大年轻一代普遍以投入迁校为荣,十分向往奔赴西安创业。迁校期间从上海出发赴海外深造,1959年后学成回国的那批人,如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等,都是直接来到西安任教。

也曾有人质疑说,交大西迁,好像老教授来得并不多。

的确,教授、副教授队伍是衡量迁校成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表面看来,迁过来的教授似乎少于留在上海的,出现在西安名册上的正教授总计只有24位先生来自上海。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1957年交大西安部分与西动的整体合并,与西工、西农部分系科的合并,这几个学校学有专长的一批教授专家(正副教授共计51人)加入了交大行列,于是这年交大西安部分已然有40多人拥有正教授职称,已超过上海部分。1959年,在采矿、地质两系离开交大单独建校,西安交大正式命名后,全校有正副教授68人,与迁校前规模相当。

仍留上海而未迁西安的教授们也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年事已高,其中70岁以上的4人,60岁以上的13人,有的已经久卧病榻,组织上决定予以照顾;二是造船、运起两个大系,本身就是要留在

上海办学的,在这里就集中了程孝刚、沈诚、周志诚等一批教授;三是机、电类专业,以及基础课教学中也还有一部分教授需要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因为到了1957年,在迁校的前提下,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都需要发展的思路已经十分明朗。像电力工程系的程福秀教授,机械工程系的郑家俊、周志宏教授,电机原理教研组罗致睿教授等,都是在迁校中带了头、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动员他们留在了上海。

相对而言,除张寰镜等个别年近六旬的老专家之外,迁来西安的教授多为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其中两位一级教授钟兆琳和陈大燮,1957年迁来时一位56岁,一位54岁。其他20多位迁校带了头的正教授中,50岁以上的是个别的,大多在45岁上下,最年轻的陈学俊38岁。而以更显年轻的副教授群体来讲,他们中的70%迁到了西安,1957年平均年龄37岁,正是创造性最旺盛的年华。后来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有庄礼庭、苗永淼、杨世铭、乐兑谦、蔡颐年、陆庆乐、蒋大宗、王绍先、石华鑫、刘耀南、王季梅、吴励坚、何金茂等。

学生中的情况是:1954级、1955级迁来西安的共计2291人,占这两个年级总数的81.1%,而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读。迁校期间(1955—1959)入学的王锡凡、陶文铨、李鹤林、苏君红、李伯虎、熊有伦、邱爱慈、孙九林、雷清泉等后来当选两院院士。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装满700多个车厢。图书设备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全校藏书约19万册,至1957年10月,运至西安的图书14万余册,占73.9%。1959年两部分单独建校时,西安交大馆藏图书50.71万册,上海交大馆藏图书30.28万册,为1.66:1。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有25个,面积较上海时扩大3倍以上,同时迁校过程中还新增实验室20多个,这样,在分设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担任学校主要领导工作的史维祥、潘季等。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即彭康、苏庄、杨文、祖振铨、吴镇东、林星、邓旭初,其中前6位迁往西安工作。邓旭初副书记同样为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后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曾任上海交大党委书

记。

再从行政领导班子看,迁校中由高教部调来担任副校长的苏庄,是仅次于彭康的学校负责人(当时陈石英副校长已任命为南洋工学院院长,南工撤销后继续担任交大副校长),1956年由他带队西迁后,就一直具体负责西安部分的工作,享有很高威望。1957年至1959年间,高教部又先后任命三位知名教授担任交大副校长,其中陈大燮、张鸿都是迁校的重要带头人,另一位程孝刚教授(学部委员),历来坚决支持交大西迁创业,态度极其鲜明,只是由于所在的运起系后确定不迁,他又兼任该系主任,才最终留在上海工作。此外,总务长任梦林从1955年4月起,就一直在西安征地建房,开创学校事业。工会主席赵富鑫教授1956年第一批带队迁来西安后,就再没有离开过。至于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造船、运起两系之外,其绝大多数迁到西安工作。党委和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上到了西安。

迁校中起了重要带头作用,并做了许多工作的,是教授中的钟兆琳、张鸿、黄席椿,以及沈尚贤兄妹、陈学俊夫妇,职工中则以沈云扉医师叔侄为代表。

四、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陈毅副总理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他表示自己准备挨骂十年。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他写给沈尚贤的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曾庆红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高校之一。

教育部的评价：

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

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

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从南洋公学到西安交通大学

——纪念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

朱继洲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交大这颗从南洋公学到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璀璨明珠的发展历程，指出西迁精神的内涵是服从需要、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是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

【关键词】西安交大 发展历程 西迁精神

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大学之一的交通大学，她的前身是创建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2016年4月8日，将迎来建校120周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主体从1956年起内迁西安后分设的西安交通大学，也将迎来西迁60周年。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120年，是中国新兴教育发展的缩影。从封建教育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从学习欧美到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从改造旧教育到建立发展人民的新型教育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我国的近代教育史，也是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发展的历程。南洋公学—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经历了这每一个转折，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一代代师生员工不辱使命、奋力前行，为国家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南洋公学：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清军惨败。就在甲午战争前后，为了使中国能够自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学习西方和日本，开办新式学堂的设想。1895年，清朝官僚中的洋务派盛宣怀奏请清廷，以“自强储才”为宗旨，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3月，又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南洋公学为

经过60年的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西北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官办民助之新式公立学校,内设师范、上、中、外四个院,即师范、大学、中学、小学4部分。先设师范学院,以栽培胜任新学教育之师资人才;遂又在师范学院附设高等小学堂,从小学毕业生依次提升进入中学。从师范生和中学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派赴欧、美、日等国大学深造,以尽快培养出一批能从事洋务、外交、新学教学的新型高层次人才。

与此同时,南洋公学还设立了具有高等程度之特班以及铁路班、政治班、商务班等,以应急需,并为设立高水准的大学创造条件;并设译书院、东文学堂以引进西方文化典籍。北洋西学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创设,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垂范于世,影响深远。

什么是“南洋公学精神”?据记载,100年前有两位校友论述过南洋公学精神。陈容认为,“南洋公学精神”的重要者有三:注重体育、注重国学国文、注重科学工艺;他认为“南洋公学精神”所汇粹之点,即爱国救民。革命先驱邹韬奋则认为,南洋公学的学风,有三方面是应该做到而又难以做到的,那就是自尊其人格而且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人格为为人之基;勤奋做学问同时又极尊重他人之勤奋学习者,勤奋为成功之诀;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知道敬重他人俭朴,俭朴为立身之本。

其后,1907年9月,国学大师、杰出的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唐文治鉴于国政腐败,又受袁世凯排挤,决心弃政从教,接受清政府邮传部委派,任邮传部隶属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校长)。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迅速,工业专门人才缺乏,于是本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开始逐步转向工科,唐文治主持校务之初即着手创办学校第一个工程专科——铁路专科,次年又建成电机专科,本校工

程教育由此肇基,学校性质为之转变,中国人自办新型理工科大学初见端倪。唐文治任校长14(1907~1920)年间,潜心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在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为交通大学(1921年定名)的发展壮大,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唐文治先生把“以明德为先,科学尚实”作为大学的使命和教育宗旨。如:直接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原版教材。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优良校风、学风的培育和学生高尚人格的养成,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倾注极大心血,求是务实蔚然成风,形成本校鲜明特色以及他的为国储才的献身精神,指导了交通大学办学的信念和准则。为交通大学“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校风和“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的形成,为交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铸就了交通大学的品格,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1937~1945年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本校辗转在重庆和上海法租界的困难环境下,继承传统、坚持办学。1937年10月,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交通大学先从沦陷的上海徐家汇校区迁入法租界继续上课;后又在重庆建立国立交通大学,尽心竭力继续为国家培养工程人才。

抗战胜利后的1946~1949年,在全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交大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他们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一系列斗争和反对美国暴行的示威游行中,所表现出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是可歌可泣的。进步学生史霄雯、穆汉祥(共产党员)在执行任务时先后被捕,1949年5月20日,在上海解放前夕,穆汉祥、史霄雯两位烈士遇

害,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史、穆两烈士陵墓,在交通大学徐家汇校区内。

纵观从学校创办时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的53年历史,经过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交通大学一直是“工业救国”的旗帜、革命的先锋和战斗的堡垒。师生们矢志探求救国救民之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追求自由、反对压迫,爱国爱校、不怕牺牲。以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良的校风、学风,培养了众多的蜚声中外的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邵力子、蔡锷、邹韬奋、李叔同、侯绍裘、陆定一、穆汉祥、史霄雯、江泽民、汪道涵等。培育了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蔡元培、凌鸿勋、白毓昆、茅以升、王安、钱学森、张光斗、吴文俊等杰出人士。

二、交通大学: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为建立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作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经过革命斗争洗礼的交通大学师生,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学校的新生,昔日的“民主堡垒”肩负起了培养造就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全校师生员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以苏联教育体制为模式,改革旧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建立新的专业,进行了教学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运动。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进行了两次院系调整。

(1)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从解放初期到1952年,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那段时期,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开展得很有成效,学习的内容紧密结合形势,从师生员工思想实际出发,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教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新人生观等专题;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树立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等光辉的形象。通过学习,有力地促使广大教师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用学习到的理论来联系解放后的所见所闻,对照自己的行动,从而对中国的革命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树立新的人生观有了初步的认识。

(2) 交通大学在全国第一次院系大调整中的贡献

1952年的全国第一次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是党和国家对旧大学系科设置庞杂、师资设备力量分散、教学内容陈旧,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

交通大学在和全国各兄弟院校一起进行的院系调整中,作出了贡献。许多院、系调往兄弟院校,有的院、系独立建校。如:交通大学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被调到复旦大学,化学系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即今华东理工大学);实力雄厚的土木建筑系全部被调入同济大学;独具特色的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等系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即今上海财经大学);纺织系分离出去成立了华东纺织工学院(即今东华大学);水利系分至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京航空学院(即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科中的电子学科支持了南京工学院(即今东南大学),1955年又支援了成都电讯学院(即今电子科技大学)。此外,还有部分院系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业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等多个学校。同时,许多兄弟院校的系科也陆续调入交通大学,给交大增添了新生力量。通过院系调整,交通大学调整为机械类、电机类、造船类共设7个系的多科性工科大学。在这全国第一次院系大调整中,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的广大教师,克服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初步树立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为进一步的院系调整工作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进行院系调整的同时,交通大学还进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教学改革的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是明确高等学校的任务,改变旧大学只设学科,仿照苏联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人才,制定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采用苏联教材和教学方法、教学制度以及建立普遍教学基层组织——教研室,健全各种考查、考试制度。交通大学基本按工艺、装备、产品以及行业等设置专业,设机械制造系、动力机械制造系、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系、电工器材制造系、电信工程系等7个系,下设27个专业,15个专修科。教育部聘请了123名苏联教育专家到上海各高等学校工作,1953—1959年间,陆续聘请来交通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就有26名。在交大任职的苏联专家认为教学计划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宪法”,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计划性。交大院

系调整后各专业先后按苏联同类专业制订了本专业教学计划,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由于苏联高校是五年制,而我国是四年制,要在四年内完成苏联高校五年的教学任务,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困难,试行了午前六节课一贯制,每周周学时超过54学时,以致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习忙乱,学习效果差,并影响了学生的健康。1955年4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会议,讨论了减轻学生负担、保证教学质量、贯彻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方针的问题,决定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

在当时的教学改革中,交大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教材,特别是基础课,如当时采用了别尔曼的《高等数学》、福里斯的《物理学》、伏龙科夫的《理论力学》、别辽亚夫的《材料力学》等。为此,很多老师突击学习俄文,边教边译,积极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有关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法指导书和各种教材。从1952~1953学年起,期末考试课程全部实行口试,并实行5级记分制。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十分重视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为了培养工程师,四年中要进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三次,在毕业设计答辩时要举行国家考试。这些教学改革中,交通大学的教师感到,学习苏联对发扬交大“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优良办学传统是相一致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教师们学习苏联的热情高涨,1954年初,高等教育部在交大召开了有浙江大学等6所高校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制定工科内燃机等4个专业的本科和专科教学计划共6份。

抚今追昔,60多年已经过去,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回望与反思这段历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改革原有的高等教育,是建国以来一次重要的战略措施,是20世纪50年代的国策,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能执行这一国策。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对我实行封锁,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高等教育的信息,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但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片面认为,苏联教育经验从思想体系到教材教法,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于苏联高等教育的缺点和错误,缺乏全面的、历史的、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对于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成功的、有益的部分,缺乏对其实施过程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分析,更没有注意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加以运用。

院系调整从宏观上改革了高等教育的类型、层次、学科、布局和形式结构,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足之处是,院系调整的有些工作比较粗糙,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有些学校的调整不够恰当。调整中把理科和工科分开,理科与农科、理科与医科分家,对管理学科的忽视,都是不妥的。交通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无论是调进或调出,有些对国家经济建设和高教事业是有利的,有些则影响到学校优良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的传承。如对理科和管理学科的调整,以致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交大又重新建设了理学院和管理学院,说明当时把理科和管理学科全部从交大调整出去是不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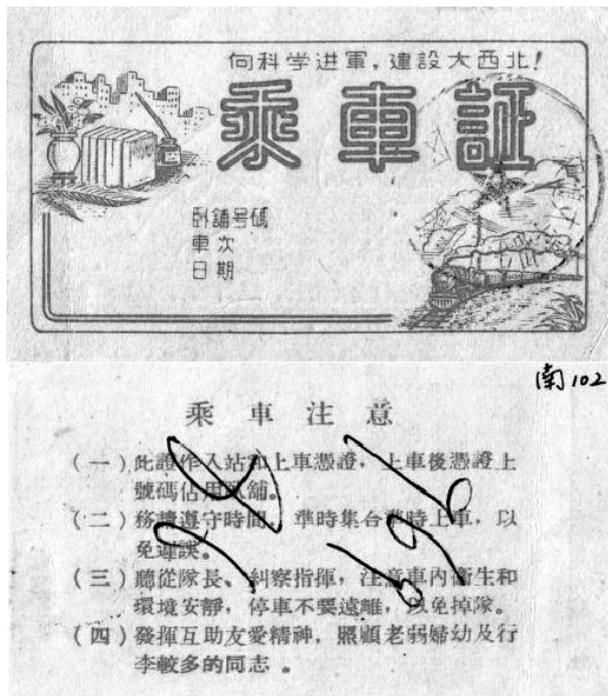
(3)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

1955年至1957年,为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家高等教育部决定进行了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计划在西安、成都、兰州、重庆、内蒙等地,由内地迁入或充实加强原有学校及新建高等学校共27所,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从1956年起内迁西安。这一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全校或大部分系科、专业内迁的,有华东航空学院、交通大学;以两所以上的学校的同类专业迁至内地为基础,新建或扩建的学校,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西安动力学院、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由有关学校抽调力量扶植的,有兰州大学,内蒙古大学等,由于支援内地而撤销的学校,有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等。

(4)从迁校西安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

1955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7月21日,高等教育部通知交大,要求交大于当年开始西安新校基建,并在次年开始搬迁工作。

到1956年夏,西安新址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工作,可以满足两个年级学生的教学、生活需要;1956年5月下旬,一批先遣的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7月20日,张鸿副教务长等第一批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5日,师生员工上千人,登上在上海徐汇镇开出的交通大学支援大西北的专列,首趟离开上海,奔赴西安。当时乘车的人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火车图案以及“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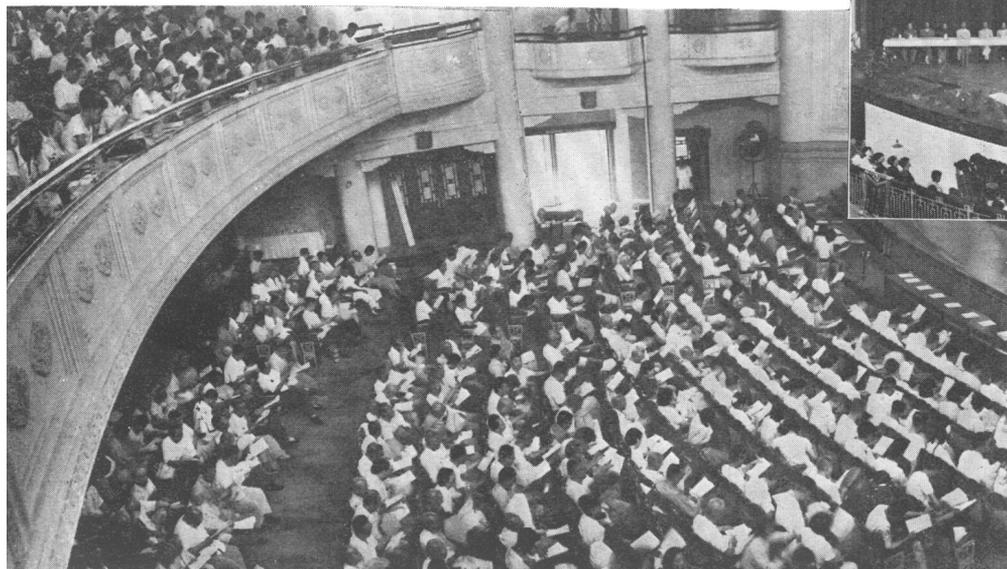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有2000余人。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西安新校正式开学上课。至此,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有师生员工及家属共计六千多人。其时,迁校工作仍在进行。

1957年3月,交通大学党委向上海、西安两地师生员工传达了毛主席两个讲话,通报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动员师生员工大胆鸣放,揭露矛盾,帮助领导改进作风。全校师生员工回顾全校一年的情况,两个多星期贴出大、小字报几万张,意见、建议数万条,引发了对迁校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搬与不搬的不同意见,认为迁校西安是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交通大学的迁校不仅仅是交大的本身,也牵涉到对全国院系调整的估价,牵涉到地方

和许多部委,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于6月4日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有高教部及国务院各有关部和中宣部等领导同志,上海、西安及两地交通大学师生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循循善诱地引导与会同志正确地分析情况,认真对待发生的问题,他说:西北是落后的,但将来会成为我国建设的巩固后方;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要从上海多调动,使全国均衡发展。周恩来总理解释,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支援西北建设,照顾国防是必要的;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去支援一部分;到1957上半年,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交通大学内部对迁校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正如程孝刚先生说的,出现了“骑虎难下”局面。但是,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等原因造成,如别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如果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那就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周总理关怀下,得出了交通大学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的方案;此后,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陆续迁至西安。

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迁校第一届开学典礼

为上海交通大学。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于1981年4月莅校时,评价说:“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大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西安交大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我国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于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交通大学这一棵已经在黄浦江畔生长了60年的大树内迁西安,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要决定,从1955年3、4月间启动,到1959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分设为两校,前后历时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1957年曾经说过:“交通大学迁校对不对,十年以后作结论,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影响深远。”

如今,交通大学西迁已届一甲子,一棵60年的大树,从黄浦江畔迁到西北高原。迁校方案经调整后,交通大学1955年底原有教师556人,迁到西安的有341人(占61.3%),1956年底原有教师767人,迁到西安有537人(占70.0%),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大部分(约80%)分配在西安部分工作,交通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人事处处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所迁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中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所以说,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

6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当年最年轻的20来岁的教职工,而今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那么,西迁给西迁交大人带来了什么影响?西迁给西北人民又带来了那些变化?

(1) 扎根西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筑西迁丰碑

1、服从需要、顾全大局,勇挑重担

1958年暑假,随着机械制造工程系四年级学生和专业课教师迁至西安,至此,交通大学主体西迁的任务顺利完成。从调整后实施的最后方案来看,是相当好的,这个方案,大力支援了西北,照顾了群众具体的困难,调整了西安、上海两地同类的高校。1959年7月,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上海部分分设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从迁校最后方案和实施情况看,达到了周恩来总理处理交

大迁校问题讲话中提出的第一方案(高的方案)的要求。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顺利解决,即从迁校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说明了交通大学的师生能自觉传承老交大人“工业救国”思想,发扬老交大人“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中国富强、要富强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的革命精神。

学校精心组织,坚决贯彻中央决定,教授带头西迁,使开发大西北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心声,多少人甘愿舍弃在上海的优越生活条件,甚至不惜无偿上交上海的住房,义无反顾,敢当建设大西北的排头兵。在交通大学西迁以及随后克服艰难险阻中,充分体现了交大人的崇高风范。

迁校,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太多熟悉的东西,改变已形成多年的生活习惯,辞别自己的高堂父母、至亲好友,勇于去一个陌生和艰苦的地方担负新的使命,开拓自己的事业、攀登新的高峰。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安和西北地区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交通大学师生员工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毅然放弃在上海比较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自觉来到西北,对于当时沿海支援内地的其他院校和工厂企业,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不少内迁单位都向交通大学看齐,以交大为榜样。1957年,交通大学师生对迁校问题的正确处理和主体内迁成功,不仅是交通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务院的院系调整战略步骤和沿海支援内地,其影响是很大的;西迁教职工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意图,维护了大局、稳定了局势、安定了人心,增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响应号召,服从祖国需要,沿海支援内地、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勇挑重担、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倡导的。

2、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

交通大学调往西安的教职工中,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去工作和安家的有近30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省市。经国家部门发出通知,由学校人事部门和有关系、室派出专人,长途跋涉,取得支持,才能陆续调往西安。1958年8月,我曾接受学校人事处委托,去上海有关单位联系几位老教师夫人的人事调动,及几位年青教师配偶的查档工作。从中我了解到,为了支持交通大学的迁校,做好配偶的调动工作,高等教育部,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市各单位对交通大学教师、

职工家属的调动给以大力配合和热情支持,不加阻拦,但其中只有少数家属能安排在校内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有很多教师的配偶(多数是夫人)在上海各个大医院当医生或主治医师,为了支持交通大学西迁,调到西安后,由于学校医务室的规模小,水平和条件又较差,她们的工作一般都安排到西安市的各大医院。即使这样,西安这些医院的工作条件与水平仍然远不能与她们原来在上海的大医院相比,而且,离开学校又比较远,以致她们不得不早出晚归,长年累月要挤公交车去上班,为家庭带来了许多的不便。这是为交通大学的迁校、为西安的建设作出的看不见的,实实在在的而又鲜为人知的贡献。

3、身处逆境、爱国爱校,不计前嫌

1957年5月,党内的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群众运动。此时,交通大学校内关于迁校方案的鸣放辩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交通大学的反右斗争就在迁校辩论中进行;因此,揭发批判中,把反对迁校和“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混在一起,对一些发表过反对迁校意见的同志,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手段,打成了“右派分子”,仅交通大学迁来西安和1956年入学(西安部分)的人员中,就有30多名教师(包括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和150名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损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伤害了同志,影响了学校的工作,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许多不赞成西迁的同志,其本意不无对交大的爱护,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负责,而并非反对社会主义。反右扩大化所带来的恶果直到今天还不能消除其不良影响。

这些受到伤害和委屈的教职工,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们不计前嫌,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忍辱负重,尽力奉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案才得以改正,他们青春焕发,才华重展,为国家建设和交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2) 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

1、艰苦创业,教学、科研迅速发展

回望历史,交大师生不仅在迁校问题上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又历经1958年“教育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等不同历史时期,西迁师生员工不辱使命、备尝艰辛,艰苦创业、奋力前行。

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关键是缺人才。交通大学西迁后,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

迁校最初10年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即达万人之多,接近解放前交通大学53年培养的毕业生总数的两倍;培养了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毕业生,大批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骨干生力军作用,为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1957年4月,高教部批准交大从下学期开始新增设应用数学、工程力学、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4个专业和工程物理系。1958年7月,学校新成立了高电压研究所、焊接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电工研究所、纺织研究所、机制工艺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采矿冶金研究所、矿产地质研究所、工业经济与生产组织研究所、应用力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摩擦磨损研究所、土力学研究所、动力研究所15个研究所。1957年1月,学校恢复出版《交通大学学报》(创刊号),在发刊词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教学改革的主要阶段,今后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就是:提高全校学术水平来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这样,科学研究就成为今后培养师资的重要方法”。自此,西迁交大人以自强不息、为在西北高原上建设好交通大学这所名校而艰苦创业,为祖国的建设,乃至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奋工作,取得成果累累。请看不完全的统计:

周惠久院士(1909—1999),1958年率全家迁到西安,任机械制造系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1984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周惠久院士作为我国金属材料强度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在材料强度、塑性和韧性合理配合理论、小能量多次冲击理论和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的科学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的课题组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重大成果在1965年被誉为全国高校“五朵金花”之一。大量学术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材料强度研究成果花开遍地,培养出成百上千有成就的材料强度科学技术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骨干生力军作用。

“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惠久教授移植在西安交大这块沃土上的光辉的奇葩,是交通大学西迁后取得的重要成就。

陈大燮教授(1903—1978),是著名的热工专

家。在上海时,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两次。迁校时,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

陈大燮教授担任副校长后,仍坚持上讲台,并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教师成长。青年教师试讲,他坐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他勉励青年同志既要严谨治学,又要敢于严格要求;要把课讲得像“说书”一样吸引学生,并且带动大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1956年9月10日,西安新校开学典礼上,陈大燮先生讲话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更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由陈大燮教授创建的热工课程教学团队,50多年来,一直是西安交通大学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团队。

张鸿教授(1909—1968),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交通大学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后,他毅然携病妻弱女,带头来到西安创业,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

张鸿任副校长后,把老交大传统总结为四句话:“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广为传诵。认真加强了教学工作的管理,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抓好教材建设、实验课程、教学实习等环节,奠定了西安交大重视教学的声誉,发扬了老交大优良的传统。由张鸿教授创建的大学数学教学团队,50多年来,一直是西安交通大学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团队。

钟兆琳教授(1901—1990),是我国电机制造事业的奠基人,1932年就自行设计制造电动机成功,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他培养的许多学生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教授和实业家,如江泽民、钱学森、王安、丁舜年、张钟俊等。

1956年搬迁时,周恩来总理曾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病卧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但钟兆琳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第一批到了西安。

他勉励青年学生说,“男女青年志在四方”。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很多地方没有开发,这些地方大部分在西北、边疆。为了民族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青年学生应当抛弃贪图安逸的思

想,挑起时代的重任。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了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学生,为交大的成功西迁,作出了贡献。

陈学俊院士(1919—),1957年陈教授全家由上海迁来西安,1980年,陈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陈学俊教授在1979年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使得西安交通大学在两相流与传热方面的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校之一。他担任这一重点实验室主任与40余位研究人员从1990年至1998年进行热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还出色地进行应用研究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对动力工程及核反应堆工程安全问题,做出卓越的贡献。他获得过5次国家级奖及6次部委省级奖。

汪应洛院士(1930—),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195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1958年响应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全家随校迁往西安,60多年来,随着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壮大,在西北这片沃土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工程专门人才。他们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有的担任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或教育战线有学术专长的校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

他一贯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只有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才能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他身体力行,一贯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认识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80年代以来,他率先在中国推动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受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制订系统工程科学发展规划,主持十余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推广应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屈梁生院士(1931—2007),1958年举家随交通大学西迁古城西安,作为中国机械故障学的奠基人之一,屈梁生在国内率先将时间序列方法应用于机械工程领域,他提出的“诊断是以机械学和信息论为依托,多学科融合的技术,本质是模式识别”的学术思想,在业界影响深远。他首创的全息

谱理论等多项发明成就,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冶金行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为国家节省亿万资金。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在机械故障和状态监测领域走在世界前列,2003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大宗教授(1922—2014)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奠基人。

近30年来,蒋大宗为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蒋大宗在计算机辅助医学诊断、功能性神经电刺激、生理信息的提取和信号处理技术、X线数字直接成像和双能量成像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

由于蒋大宗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杰出贡献,2006年10月,蒋先生当选为IEEE Life Fellow(终身会士),也是当选IEEE Life Fellow的第二位中国人。

唐照千教授(1932—1984)1953年毕业于留校后,随校西迁;在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力学界的关注和工程界的好评,被校党委确定为重点培养教师。

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拘留审查达4年零7个月之久。1973年被释放出狱后,他不念旧恶,埋头苦干,发奋读书和做实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计算“止裂”的动力学模型,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重视。1980年4月,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修;在美国2年多,取得科研成果6项,有两篇论文在全美力学会议上宣读;将大哥送给他购买小汽车的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资料、电子器件和磁带;他拒绝亲友的挽留,如期返回学校。在妻、儿不在西安情况下,再次单身一人在西安工作,当时上海有的单位以优厚待遇和条件聘他去工作,但他积极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坚持留在西安工作。

1983年,他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

1984年11月,唐照千不幸患癌症逝世,终年52岁。

万百五教授(1928—)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亲是上海市文化界有名的“万氏三兄弟”之一动画家万古蟾。西迁时他丢下年迈的父亲,来到西安;

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他们夫妇在学校工作忙,上海的爷孙们就互相照顾着生活,先是爷爷照顾孩子,后来孙子长大了,能照顾年迈的爷爷。每每提到这段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涌动着酸楚。在西迁的交大人中,像万百五教授这样的独子(独女)的人不少,他们扔下个人的小家来到西安,想的是、为的是祖国的大家庭!这就是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万百五教授是自动化和系统工程专家,是中国大系统理论与应用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谢友柏院士(1933—),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内燃机制造专业并留校执教,后随校西迁,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所长(1986—1997),润滑理论及转子轴承系统国家教委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1994—1999)。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

谢友柏教授和许多同志经过40多年的共同努力,把一个研究小组发展成研究室,最终成为在流体润滑理论、轴承技术和转子-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中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所。而同时发展起来的实验室也被国际同行认为是大学里这一领域中最大的实验室,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国际上还没有的试验台。

林宗虎院士(1933—),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现任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热能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在热能、核电、石化等工程的重要理论—气液两相流与传热学科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在气液两相流方面,创建的林氏公式,被国际上推荐为最佳式,并被收入国内外6本著作,被引用数十次。开拓了传热研究新方向。在多相流测量方面,首先解决了用一个元件同时测定两相流量和组分两个参数的国际难题并得到专利和应用,经济效益显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及中国专利12项。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著作有2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姚熹院士(1935—),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电介质研究中心主任,“电子陶瓷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姚熹是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家,他是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在铁电陶瓷研究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并被国内外同行看成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代表。

孟庆集教授(1932—),1956年交通大学涡轮机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受化工部邀请担任对外商技术谈判主谈中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用大量的计算数据和科学理论,透彻地分析了事故是由于叶片设计存在着强度方面的根本性错误;谈判以我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对方同意了我方赔偿的合理要求。

孟庆集以真才实学取得对外索赔胜利的消息,198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在和外国厂商技术谈判中显才能——孟庆集分析质量事故有理有据”作了报道,并以孟庆集等人的事迹,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作了转载,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孟庆集与外商谈判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为“臭老九”平了反,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争了光。

198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以此为背景发表了《论破格》的社论,强调选拔、使用人才,要坚持正确的标准,主要看本人的贡献大小、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高低,提出要破除“论资排辈”,像孟庆集那样的优秀人才应该破格提升为教授,鞭挞了社会上各种“论资排辈”、影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现象。

俞茂宏教授(1934—),195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分配到交通大学工作,后随校西迁。在2012年2月14日揭晓的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中,俞茂宏的“双剪统一强度理论及其应用”以其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系统性的创新性成就和贡献、并有显著应用成效的成果荣获二等奖,被科技部奖励办认为“成果突出,意义重大”。荣誉的背后是俞茂宏教授50多年的艰难探索,是他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与执著、责任与奉献。

早在1961年,俞茂宏就提出了双剪概念,并推导出双剪应力屈服准则,突破了“最大剪应力”或“单剪”这一传统概念。1985年他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更为全面的“双剪强度理论”。在此基础上,1991年,俞茂宏正式发表统一强度理论公式,将各种单一的准则和理论发展为“统一强度理

论”,用了整整30年时间。之后,俞茂宏又用20年的时间,研究将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扩展到结构强度理论,推出一系列结构塑性分析的新方程,应用于一些典型结构问题,得到一系列序列化的结果,使双剪统一强度理论趋于完善。俞茂宏的理论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他已经在世界著名科技出版集团Springer出版了四部英文著作,反响很好。Springer希望继续得到他下一本书的书稿,世界其他著名出版社也与他联系出版新的著作。

俞茂宏教授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冷板凳”上,一坐就是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突破了百年来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统一强度理论难题,提出并发展形成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成为第一个写入基础力学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

以上只是部分反映了迁校后的交大人继承和发扬交通大学爱国、爱校,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吸取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延安精神,在条件相对艰苦的黄土地上,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的辉煌业绩,做出的令人自豪的卓越贡献。

(2) 弘扬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良的办学传统

在交通大学迁校过程中,学校领导干部、学术带头人、党团员起到了带头作用,积极服从组织安排;特别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胸怀建设西北大志,顾全国家战略大局,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处理了上海的住房,携老带幼,自觉地来到西北。如:陈大燮、张鸿、钟兆琳、沈尚贤、陈季丹、严峻、朱麟五、陈学俊、赵富鑫、黄席椿、周惠久、孙成璠、吴之凤、顾崇銜、张景贤等教授,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如:万百五、蒋大宗等。

是西迁交大人,带来了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教风和校风;带来了严谨的教育教学经验、踏实的教学管理经验;带来了勇攀科学高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豪情壮志。

西安交大师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带头、示范和辐射作用。教师深入厂矿搞科研、调查研究,带领学生下厂实习,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下放农村劳动,搞社教、扶贫支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虚心学习工农群众优秀品质的同时,普及了科学技术知识,传播了先进文化,弘扬了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为西北地区精神文明建

设作出了贡献。

(3)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

将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迁到西安,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

西安交通大学不仅保留了机、动、电传统学科的国内领先优势,而且新建了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数理力学系,奠定了西安交大多科性大学的基础,1959年即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中,都被列为重点建设单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的支持下,在教育部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首批建设的行列。学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圆满完成了“211工程”“九五”建设任务,为教育、科技、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9年列入国家首批跨世纪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即985工程)的2+7所大学之一,承担起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崇高使命和艰巨的任务。

1984年国务院批准西安交大试建研究生院,教育部批准西安交大恢复管理学院,学校开始向综合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方向发展。

1986年6月4日,原国家教委何东昌副主任来校参加交通大学建校90周年暨迁校3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新中国成立后,迁校成功的例子不多,西安交大迁校以后,能够很快在西北站住脚,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教学传统和革命传统,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不少成果,确实非常值得纪念。”

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在长篇讲话中指出:“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老校友江泽民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1989年9月13日第一次回到母校,看望他当年的老师时,他说:“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读的电机系基本上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我同交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应该来看望我的

老师。”2005年,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学校工作时,对交大迁校以来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十分关怀西迁老同志的工作和住房状况,就此作出重要指示,后由中央拨专款支持学校兴建小高层4栋楼,解决了近400户西迁老职工的住房问题。

至今,有不少年轻教师,在听到西迁经过和事迹后,会向那些两鬓斑白、年届古稀的老教授、老干部和职工发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您们是自觉自愿的吗?有没有后悔过?”不少老交大人的回答是:“我们不后悔,我们的选择是自愿的,我们听党的话。吃亏不吃亏,要看用什么尺子量。我们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不言而喻,西迁使这些交大人的生活带来不少困难,乃至他们子女的一生轨迹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其中,数百名西迁时已是中年的交大人,如今已经长眠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是开发西部的先行者,他们对祖国大西北的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一代老交大人扎根黄土高原,传承和创新了交通大学的文化,筑成的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挑重担,尽职尽责、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丰碑却历久弥新!实现了周总理寄交大人以“支援西北建设”的殷切期望,这是西安交大人的骄傲,发展、创新西安交通大学需要它,开发大西北仍然需要它。

【参考文献】

- [1] 陈容.南洋公学之精神.《南洋》第1期.转引自《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 [2] 邹韬奋.对吾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感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1卷1期,1917年4月.转引自《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 [3] 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
- [4] 交通大学校史编委会,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5] 凌安谷等.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

爱国主义永远是交大人前进的大旗

王世昕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爱国主义是交大人的光荣传统,交大西迁是交大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的又一次践行,指出爱国主义将永远是交大人前进的旗帜,西迁精神的精髓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

【关键词】爱国主义 西迁精神 交大人前进的旗帜

在交通大学西迁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交大人都在议论“如何发扬交大西迁精神”,终究什么是西迁精神?

有人说西迁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人说是“顾全大局的精神”,也有人说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的精神”。我认为西迁精神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发扬了交大的传统精神——爱国主义精神。

一、爱国主义是交大人的光荣传统

为国“自强”立校。早在盛宣怀建立南洋公学之时,提出的办学目的就很明确,是为了国家“自强”,“自强首在储才……”为此他游说朝廷,积聚多方力量办起了这所学校。当时国家外受侵略,国无主权,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种种屈辱;内受腐败政府的残酷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极度贫穷,无人权保障,无生存权利的状态。国家日趋衰亡。为了拯救中国,改变国家面貌,爱国人士都在寻找强国之路。此时,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提出了以“储才”救国的方略。从现在认识这一方略不完全正确,但毕竟是爱国之举。也确实为推进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如交通大学校歌中表述的“美哉吾校,真理之花,邦国之荣华……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为世界之光”。

交大师生传承了这种为国“自强”的爱国主义

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交大师生面对日寇侵略,占领了大片热土,实行了“三光”政策,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交大师生为了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投笔从戎发起了救亡运动,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战争,有的还牺牲了生命。1946年、1947年为抗议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交大师生不畏敌人的强大,两次成立了抗暴委员会,联合上海各校,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直到成功。1948年春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把中国变成美日殖民地,交大师生联合全市各界又一次发起了“反美扶日”“拯救民族危机”运动,同美、日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最后也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后,交大师生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继续多次发起学生运动同国民党腐败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全国早日解放,走国家富强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一系列的爱国主义运动中,交大师生继承发扬了爱国主义理念和习性,同时不断经受了爱国主义运动的锻炼和考验,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交大人思想行动的精神支柱。

二、交大西迁是交大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的又一次践行

交大师生员工积极支持学校西迁的主要精神支撑仍然是传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有了

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撑,使我们交大师生建立起了克服迁校过程中种种困难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保证了迁校工作的顺利完成。

交大西迁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交大迁校不仅要搬迁几万件机器、设备、仪器仪表,更主要的是要让上万名师生员工,尤其是教职工及其家属,拖小带老自愿告别已经长期习惯居住的繁华富裕的大城市——上海,迁到一个陌生的贫穷落后的小城市,而且要准备长期居住下去。但是尽管迁校过程也曾有些波折,从中央决策后仅一年半左右,迁校成功了。这不能不看到,是精神力量起着重要作用。迁校至今近60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迁校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不仅使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布局走向了合理,而且对西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交大等重要单位西迁行动的带动下,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工厂企业和相应的文化单位也迁到了西北,并扎根于西北,使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迁校的成功不是上万人一时的情绪冲动或是简单的“服从”能说明的。而是长期接收爱国主义熏陶的积累和沉淀的必然。

1955年我高中毕业,毕业前早已知道交大要西迁,我还是报考了交大,而且进了交大第二次选择专业时,仍然选择了西迁的机械制造专业,没有选择留在上海的造船等专业。其原因正是经受了五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1949年全国解放,我13岁,刚入初中,当时全国人民才从长期经受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工人成了领导阶级成员,农民经过土改获得了土地,知识分子日夜盼望“知识报国”有了出力的机会,全国人民处于欢欣鼓舞的精神状态,共同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幸福,共同认识到了只有国家独立富强才能保持人民稳定、长久的幸福生活。

然而没有多久,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积极支持蒋介石组织反攻大陆,不断骚扰我们的海防前线,妄图复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这就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爱国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我和同学们一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在群众自发掀起的捐献资金购买飞机大炮的活动中,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零用钱。不久又两次报名参军,决心保家卫国。尽管第一次因为年龄不够,第二次年龄够了,体检复查时查

出有血吸虫病而被淘汰,但却接受了一次深刻的人生洗礼,较深地认识到了爱国主义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还必须包含牺牲,甚至生命。报名参军要上前线去打仗,不是玩的。

在这大好时机,学校进一步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除了课堂教育外,宣传介绍了很多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如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丹娘,中国的张思德、黄继光、向秀丽等。大量先进事迹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任何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都来之于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任何先进事迹的背后都有着正确的思想指导;任何先进事迹的背后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且要有作牺牲的准备。

因此,当毛主席说“中国目前还是一穷二白……但这恰恰可以让我们画出最美最秀的图画。年轻人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之后,在年青人中自发提出了“艰苦的地方,年青人不去,谁去?”“越是困难的任务,越应当承担”,很多年青人还把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碌碌之无为而羞耻……”以此来鞭策自己,珍惜生命的每一刻,把“奋斗”“奉献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光荣。就在这大形势影响下,我同很多师生一样,逐步形成了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树立了为祖国献身的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持西迁就自然而然的了。

我大学毕业后,依然留在西安工作,1999年退休后又到老年大学工作,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新知识,增添生活乐趣的机会,为实现为西北奉献一生的诺言继续努力。

迁校至今已近60年,每当回想60年来的经历,看到学校的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时,为我们一代人在这成绩中曾献出过微薄之力,为我们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参与了交大西迁,为中国西部开发做过努力而感到欣慰。

三、爱国主义永远将是交大人前进的旗帜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理念,也是最能团结各界人士为理想奋斗的旗帜。

不同性质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属社会主义性质,是从大多数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价值观。